

# 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

——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

余南平 黄郑亮

**内容提要:**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实力源于自身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德国成功地将自身经济力量转化为引领欧盟一体化方向的主导权,领导欧盟应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各种挑战。在此过程中,德国基本承接了区域内权力的转移,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本文将经济学范畴下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下的“权力转移”概念相结合,以此来分析德国掌握欧盟区域主要权力的原因与表现方式,并借此探索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权力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区域价值链 主导权 德国

## 一 引言

近年来,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题。之后有关中美是否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频繁出现在各种学术讨论和文献研究中。格雷厄姆·艾利森本人则出版了专著,拓展了其宏大历史观的解释,并以《注定一战》为书名在中国出版发行。他在专著中对历史上16个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全球竞争案例和战争场景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一

\* 本文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2018年度课题“贸易战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变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种结构性压力,认为中美妥善处理关键领域利益分歧可以避免灾难性战争的发生。<sup>①</sup>艾利森从历史学视角出发的解释无疑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通过全球价值链已经形成复杂的全球产业链链接。这种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任何守成国对崛起国的“反击”,甚至是崛起国对守成国的“主动出击”,在过去都不会对其国内经济造成中断性影响,但如今任何过度损害全球价值链的行为,都将引发全球性生产中断并导致全球性灾难,而这是修昔底德时代、一战时代和二战时代都不曾出现过的问题,也是历史学视角无法解释的问题。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现实存在,除了在全球化时代发挥生产、消费、资本、资源和技术配置功能外,对国际权力有什么内在影响?全球价值链是否能够作为理论范式,来解释和检验当下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各种约束条件,并分析民族国家相对优势的获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 二 命题的提出与基本概念

国际权力转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研究对象之一,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变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的经济现象之一。两者之间是否构成有机的内在关系?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或者是区域价值链的位置与变化,能否对应这个国家的国际权力变化,并从根本上解释国际权力转移?本文尝试就此做出回答。

### (一) 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全球生产和交换领域的客观现象,现实地嵌入在当下全球化过程中。而将“价值链”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企业活动进行结构性分析,始于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率先提出的“价值链”概念。他立足于企业创造价值行为,认为企业涉及增加值的活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了一条紧密的链条,即为企业间的“价值链”。<sup>②</sup>如果说迈克尔·波特是“价值链”理论的提出者,那么把“价值链”理论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并形成固定的理论解释范式的,则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其在2005年就提出了全球价值链

<sup>①</sup>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sup>②</sup> 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的相关著作在中国的发行量较大,其关于价值链论述的著作可参见[美]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而其后期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和“钻石国家”理论,已涉及国家竞争力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具体可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在杜克大学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心。<sup>①</sup>杰里菲认为,全球价值链“描述的是企业和劳动者将一项产品从概念变成最终使用以及其他的所有活动,包括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分销和最终消费者支持……在全球化背景下,价值链活动更多地由全球范围的企业间网络来完成”。<sup>②</sup>随后,杰里菲又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两个分析路径:从价值链主导企业角度的“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以及从地方经济的角度“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杰里菲教授的研究,被广泛应用于现实的全球价值链分析中,成为解释全球化生产体系构成和变化的有力工具之一。<sup>③</sup>

除了学术界外,一些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也涉足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并对全球价值链做出了更为细致和实际的分析。2002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对全球价值链做出如下定义:“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该生产链涵盖商品生产与服务环节,这种连通区域的生产、加工、销售、回收等环节的跨国性生产网络,可被解读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链。”<sup>④</sup>2018年,由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多个国际机构联合策划并出版了《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一书。该书借助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证比较,帮助公众和各国政策制定者理解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演进,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sup>⑤</sup>除此以外,美国杜克大学、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等一些学术机构也建立了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这些现实的数据分析对理解当下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结果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不仅取决于本国的工业化水平,还与其经济开放度相关联。而这是否直接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国际权力的来源?主权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份额与所处位置的差异,导致国家权力增长速度的不同,是否也是当今全球国际权力转移的主要驱动力?目前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的讨论仍然局限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对国际权力转移的观察也主要从历史、政治、经济等传统的视角切入,全球价值链并未充分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

## (二)工业化时代的国际权力解释

<sup>①</sup> G.Gereffi, J. Humphrey and T.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2, No.1, 2005, pp.78-104.

<sup>②</sup> [美]加里·杰里菲等:《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和政策分析》,曹文、李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sup>③</sup> 运用全球价值链并通过全球经济活动中“分离”现象进行研究的还有鲍得温等人,具体参见 R. Baldwin, “Globalis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 (S),” Working Paper for the Project “Globalisation Challenges for Europe and Finland”, 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 2006.

<sup>④</sup> 转引自张莱楠:《大变革:全球价值链与下一代贸易治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前言,第1页。

<sup>⑤</sup> [美]杜大伟、[巴西]若泽·吉勒尔梅·莱斯、王直主编:《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权力”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亦或是建构主义,都没有回避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可以说,权力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权力的存在始终嵌入现实的国际关系中。

自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确立以来,国际关系史本身就是一部民族国家权力此消彼长的变换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民族国家权力对比的梯次变化和循环演进?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肯尼斯·奥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在1958年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中,他指出,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其权力对比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将会发生转移,这种转移依托于各国的工业化水平。<sup>①</sup>为此,奥根斯基采用“潜在大国”“权力增长”和“权力成熟”三个时期来描述国际权力的转移,分别对应农业、初级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三个阶段,并以各国实力不同的增长率为视角解释国家权力的此消彼长。<sup>②</sup>

在理论界,针对国家权力来源的问题,不少学者与奥根斯基的看法基本一致。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主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权力,并由此创立了“结构性权力”这一概念。在其著作《国家与市场》中,斯特兰奇提出了安全、生产、金融 and 知识四大结构性权力的来源。生产是结构性权力的来源之一,在国内控制生产可以巩固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权力,建立相应的政治机构,完成对国内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深入,与生产相关的结构性权力逐渐对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产生影响。<sup>③</sup>无独有偶,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在其著作《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中也推崇工业化对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他在分析19世纪欧洲均衡破灭和英国霸权告终的原因时写道:“洋葱皮下的第一层是工业化的不断扩大,但这种扩大是不平均的……不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决定了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潜力,只有工业化竞赛的前几名才维持得起强国的地位。”<sup>④</sup>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语境下,权力内涵的指向更多地偏重于“控制权”,即权力优势国家凭借自身或者联盟实力的强大,通过军事征服、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方法控制其他国家的行为。但问题是,在深度的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时代,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共享、物流联通和市场整合,企业跨国界按产业链进行整合,国家间的

①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Knopf, 1958.

② 奥根斯基等人以GDP变化进行比较的实证论述和模型构造内容,参见 <https://www.acsu.buffalo.edu/~fczagare/PSC%20346/Kugler%20and%20Organski.pdf>, 2019年4月2日访问。

③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杨宇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④ [加拿大]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相互依赖”是通过企业的全球性生产网络勾连完成的,权力优势国家没有必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去控制其他国家,而且产业链“脱钩”的风险更是巨大的。<sup>①</sup>因此,当传统“工业化”权力事实上隐形让渡,或者是经济权力已经植根于全球价值链的“实际权力”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全球价值链时代的权力呢?

### (三)全球价值链时代背景下的权力解释

既然“意大利面碗”效应下的国际经济活动是以网络化和产业链嵌入式存在的,每个民族国家无须甚至也无法建立起完整的与外界不发生联系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sup>②</sup>那么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权力就会以“工业化时代控制权”开始向“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模式演进。这种国际主导权的表现形式体现为对发展能力和方向的带动作用、对制度规划的影响作用,以及在区域整合议程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关于国际主导权的概念,学界目前并无清晰界定,更多的是将其等同于大国关系中的势力范围、区域合作中的领导地位,或者是国家为全球和区域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如陈峰君在《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一书中给出了如下描述性定义:“主导权问题说到底就是领导地位问题,也即权威性问题……表现为具有决定区域内规则的能力和引导一体化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作用。”<sup>③</sup>也有学者认为,主导权就是区域合作中一方或几方对合作进程的主导,其核心在于一种非中性的利益或制度取向。<sup>④</sup>在理论抽象性解释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也开始关注欧盟区域内的“德国现象”,并对欧盟区域内的德国主导权进行分析研究,如德国学者吉塞拉·穆勒(Gisela Müller)教授立足于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在《德国:欧洲唯一的领导力量?》一文中写道:“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近两年中,德国发挥了主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实际情况要求德国确定目前的欧洲政治角色”。<sup>⑤</sup>与此同时,另一位德国教授汉斯·穆尔(Hanns W. Maull)也持相同的观点:“德国在国际安全上的边缘化,与德国在欧盟内部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形成鲜明对比,在遏制和克服债务危机的努力下,柏林主导的趋势

<sup>①</sup>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全球性生产以产业链垂直跨国配套整合而非以本土产业全产业链配套的特征,几乎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不与外部世界发生生产性和消费性联系。因此,以传统的“工业化”权力,包括以禁运和贸易战等手段控制他国是困难和成本高昂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引发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

<sup>②</sup> “意大利面碗”效应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加迪什·巴格沃蒂于1995年在研究双边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时提出,指不同贸易优惠和原产地原则产生了复杂的交织性的贸易结构,具体论述参见[http://www.columbia.edu/cu/libraries/inside/working/Econ/ldpd\\_econ\\_9495\\_726.pdf](http://www.columbia.edu/cu/libraries/inside/working/Econ/ldpd_econ_9495_726.pdf),2019年4月2日访问。

<sup>③</sup> 陈峰君、祁建华:《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35页。

<sup>④</sup> 王玉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的超越》,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

<sup>⑤</sup> Gisela Müller, „Deutschland – Europaseinige Führungsmacht?“ 1/3/2012, <http://www.bpb.de/apuz/75788/deutschland-europas-einige-fuehrungsmacht>, last accessed on 2 April 2019.

日益明显”。<sup>①</sup>而在美国学者马蒂亚斯·马蒂斯(Matthias Matthijs)看来,德国已经是欧盟不可或缺的国家,面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欧盟最终如何应对其三重危机,以及它能否更强大和更团结,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柏林如何利用其新式权力。欧洲的未来最终取决于德国的领导命运能否满足其愿望”。<sup>②</sup>

上述论述显然描述了“主导权”的存在,但我们希望解释的问题是,人们通常描述的“主导权”是如何获得的?“主导权的基础又是什么”?这种“主导权”在全球化时代能否以理性工具进行较为精确的概括?主权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结构,能否充分解释区域乃至国际“主导权”的存在?以下我们以德国作为典型案例来解释其在欧盟区域权力的来源和构成。<sup>③</sup>

### 三 德国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sup>④</sup>

历史上,欧洲是现代国际关系各种问题研究的典型样本地区,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欧洲大国围绕权力进行了数百年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成为世界性霸权国,与美国开启了半个世纪的争霸历程;英国凭借英联邦体系与英美同盟关系,也保有了一定的权力;法国作为西欧陆上强国,曾一度引领西欧的一体化进程。放眼欧洲各大权力主体,只有德国在二战后长期背负战败国的身份,受到国际社会的长期怀疑和隐形压制。然而,自2010年以来,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在欧洲经历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以及俄罗斯战略压力上升等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局面时,德国却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表现最好的国家,尤其是经济上的优异表现已使德国成为欧洲区域发展的主导国。那么德国是如何经受住各种危机的考验?如果基于德国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一视角,我们能够发现什么?

<sup>①</sup> Hanns W. Maull, „Außenpolitische Entscheidungsprozesse in Krisenzeiten“, 1/3/2012, <http://www.bpb.de/apuz/75797/aussenpolitische-entscheidungsprozesse-in-krisenzeiten>, last accessed on 2 April 2019.

<sup>②</sup> Matthias Matthijs, “The Three Faces of German Leadership,” *Journal of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8, Issue 2, 2016.

<sup>③</sup> 一个必须解释的概念和逻辑是,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权力与区域权力是重叠对等的,如美国最为典型,同时具有区域权力的大国并不一定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国际权力,如印度在南亚,南非在非洲,土耳其在中东……而欧盟情况比较复杂,作为超国家机构,欧盟自身具有独特的国际权力与区域权力,同时在欧盟内还有英国、法国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国家角色行使国际权力。我们所用德国案例是指德国以控制欧盟权力来行使国际权力,并同时获得了欧盟区域内的实际权力。

<sup>④</sup> 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目前全球已经形成欧洲以德国为中心、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美洲以美国为中心的三大全球价值链中心。考虑到欧盟内部贸易总量占欧盟贸易总量近70%的现实,德国作为欧盟区域价值链中心的同时,也对外体现为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之一。德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分析参见[美]杜大伟、[巴西]若泽·吉勒尔梅·莱斯、王直主编:《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第75页。

### (一)从区域产业链角度的观察

提起德国经济,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其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可以说,德国经济的崛起与繁荣,其根基便是发达的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崛起,始于19世纪末俾斯麦统一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开启了“国家工业化”的政策,对外进行贸易保护,对内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使德国在20世纪初完成了工业化,其钢铁、化学、电力等产业位居世界领先地位,到1913年已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对德国制造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德国也被分裂为东西两德,但在战后民主化改造与欧洲一体化的环境下,联邦德国凭借旧的工业基础和独特的发展理念,迅速恢复了生产。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其产出比长期占据总产出的40%左右。冷战结束以后,受新技术革命和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德国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向中东欧、亚洲转移,由此导致1990年后德国第二产业的产出占比持续下降,到2001年仅占GDP的28%。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对产业结构进行干预优化,一方面推出以“工业4.0”为核心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计划;另一方面以中东欧为“离岸工厂”,重新加强德国的制造辐射群和产业链延伸,使制造业回升至总产出的30%左右。<sup>①</sup>虽然近年来德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也给第二产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其不同于以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美国第三产业,它的专业化服务本身有依附于第二产业的特征。“如针对德国所生产的机械设备而产生的整套技术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的培训,设备的调试和售后服务等,这些服务业是不可能离开德国的制造业而单独存在的,德国正是依靠之前制造业所开拓的市场,让服务业顺势而上。”<sup>②</sup>所以,从德国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经济主导力量,特别是其对全球的贸易盈余依旧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作为支撑。

分析欧盟区域价值链的形成,必须以“区域产业链”为依托,对产业链的分析则可通过对“进出口贸易”和“投入产出”的分析获得。对德国来说,制造业不仅在国内产业布局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反映在进出口贸易中。2017年,德国的商品进出口在欧盟内部贸易中呈现“一枝独秀”状态(见图1),其中商品出口额占欧盟内部贸易额的22.7%,商品进口额占欧盟内部贸易额的20.8%,所占比例远超法国、英国、西班牙

<sup>①</sup> 以上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2019年4月2日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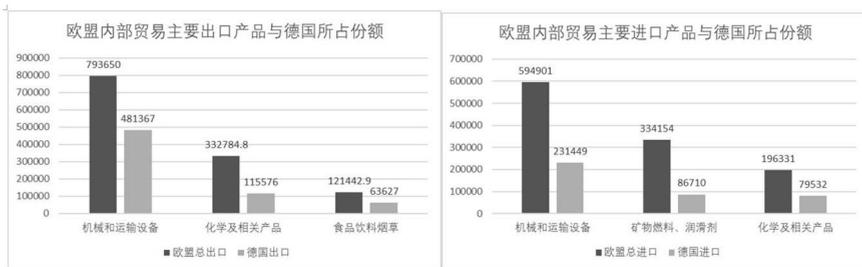
<sup>②</sup> 杨海洋:《德国制造业优势产生并保持的原因分析》,载《改革与战略》,2013年第1期,第116-121页。

图1 2017年欧盟内部贸易额(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international-trade-in-goods/data/main-tables>, 2018年11月6日访问。

图2 2017年欧盟内部主要进出口产品分类与德国绝对值(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欧盟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出, <https://www.destatis.de/EN/FactsFigures/NationalEconomyEnvironment/ForeignTrade/Tables/ImportsExports.html>; <https://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et00062&language=en>, 2018年11月6日访问。

等欧洲大国。<sup>①</sup>从进出口产品结构来看,2017年,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及相关产品、食品饮料烟草三大类产品的出口额分别占据欧盟内部出口总额的前三位,而德国这三类产品的出口量分别占据欧盟内部总出口量的60%、34%和52%;与此同时,从进口贸易来看,机械和运输设备、矿物燃料和润滑剂、化学及相关产品位列2017年欧盟内部进口总量的前三位,而德国在其中所占据份额分别为39%、26%和41%(见图2)。从欧盟内部进出口贸易中可以看出,德国凭借制造业强劲的生产能力,基本上处于欧盟

<sup>①</sup> 数据来源: 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international-trade-in-goods/data/main-tables>, 2019年4月2日访问。

产品贸易的中心地位:德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欧盟各国带来了生产的动力基础,是欧洲“工厂设备的供应商”,而庞大的进口额则使德国充当了欧盟“最终消费国”的角色,是欧盟区域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sup>①</sup>

通常意义上的对德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的研究,还不能充分反映德国在欧盟区域产业链的地位,因为产业链不仅需要考察国家间商品的流动,还要基于全球与区域价值链的客观存在考虑对生产流程的“分解”。因此,对区域产业链的研究还需要引入“投入产出”的概念,以更准确细致地说明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与“产出”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在“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以各国在生产环节中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可分为“中间品”贸易与“最终品”贸易两类。其中,“中间品”贸易就是指商品在实现最终消费前的一系列分工贸易,或者说,发生在从初级原料到最终产品的生产流程的国际贸易就是中间产品贸易。“最终品”则是指生产结束、不再进行加工的产品。这部分产品被直接使用或者最终消费,以最终品为对象的交易就是“最终品”贸易。因此,“最终品”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环节和产业链的终结。如果分析从1995年至2011年每五年间,欧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的情况,以及德、法、英等国在欧盟“投入产出”中所占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指标中,均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见表1)。在全球产业链中,中间品代表着生产,而最终品则代表着消费,这就再一次印证:德国既是欧盟区域产业链的最大供应国,又是欧盟的最大消费国。通过“进出口贸易”和“投入产出”这两大指标,充分反映了德国处于欧盟区域产业链的核心,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先地位。

从表1可见,除了德国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地位外,如果我们采用结构性数据分析还可以看到,就反映区域价值链的核心能力的中间品进出口份额而言,从1995-2011年的16年间德国基本保持不变,而欧洲其他四大经济体中,除西班牙(其经济体量仅为德国的三分之一)外,另外三大经济体均有2-3个百分点的下降;同时,该现象还体现在最终品出口中,这不仅解释了德国国家财富的来源,也反映了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基础稳固和区域地位的相对上升。

<sup>①</sup> 从理论角度而言,无论在全球一体化还是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最终消费国”都是贸易增长的驱动力。

表1 STAN 统计下德国在欧盟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地位(单位:百万美元)

	时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1年
中间品出口	欧盟	1337163.7	1496778.4	2570178.3	3300332	3867882.8
	德国占比	22.90%	20.58%	22.21%	22.51%	22.70%
	法国占比	13.49%	12.73%	11.64%	10.32%	10.31%
	英国占比	13.64%	14.73%	13.09%	12.18%	12.08%
	意大利占比	10.64%	9.81%	9.66%	9.11%	9.12%
	西班牙占比	4.61%	5.34%	5.65%	6.03%	6.23%
中间品进口	欧盟	1333471.1	1579340.9	2626635.8	3408879.1	3956990.5
	德国占比	19.62%	17.97%	17.40%	18.16%	19.50%
	法国占比	13.42%	12.86%	12.35%	11.64%	11.77%
	英国占比	13.15%	13.38%	12.10%	11.69%	11.60%
	意大利占比	11.21%	10.90%	11.18%	10.78%	10.81%
	西班牙占比	6.40%	7.42%	8.42%	7.51%	7.45%
最终品出口	欧盟	2460785.2	2671546.8	4395205.6	5564485.9	6438388.9
	德国占比	22.07%	20.30%	21.84%	22.03%	22.24%
	法国占比	13.69%	13.34%	12.17%	11.12%	11.00%
	英国占比	12.80%	13.85%	12.28%	11.57%	11.47%
	意大利占比	11.74%	10.92%	10.41%	9.72%	9.75%
	西班牙占比	5.40%	6.24%	6.53%	6.76%	6.92%
最终品进口	欧盟	994369.3	1088325	1688909.6	2027330.7	2251489.1
	德国占比	26.89%	23.33%	21.34%	20.89%	21.06%
	法国占比	13.78%	13.14%	13.50%	13.97%	14.58%
	英国占比	13.56%	17.31%	17.14%	14.75%	14.25%
	意大利占比	9.77%	10.19%	9.91%	10.64%	10.36%
	西班牙占比	4.85%	6.39%	7.61%	7.48%	7.4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OECD 的 STAN 数据库资料计算得出,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75537#>, 2019年3月29日访问。

表1反映的是 STAN 统计项(反映的是年度产出指标、劳动力投入与投资、竞争力和总体结构变化)下的数据结果。如果我们在全球竞争的视野下、以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角度来分析德国全球价值链的话,还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见表2)。

表 2 TIVA 统计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增加值指标(单位:百万美元)

	时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中间品出口	欧盟	1399183	1785594	1845118
	德国占比	19.49%	19.76%	19.80%
	法国占比	11.97%	10.77%	10.71%
	英国占比	11.48%	10.54%	10.48%
	意大利占比	9.12%	7.89%	7.06%
	西班牙占比	5.92%	5.85%	5.67%
中间品进口	欧盟	1399183	1785594	1845118
	德国占比	17.26%	19.02%	18.56%
	法国占比	12.04%	12.18%	11.52%
	英国占比	9.82%	8.91%	9.22%
	意大利占比	11.07%	9.63%	8.50%
	西班牙占比	8.04%	6.18%	5.95%
最终品出口	欧盟	1116827	1260546	1288932
	德国占比	19.15%	19.93%	19.67%
	法国占比	13.36%	11.62%	10.68%
	英国占比	8.53%	7.94%	8.06%
	意大利占比	10.50%	9.22%	8.24%
	西班牙占比	8.72%	8.43%	8.09%
最终品进口	欧盟	1116827	1260546	1288932
	德国占比	17.01%	18.01%	17.59%
	法国占比	13.80%	13.72%	13.65%
	英国占比	16.58%	13.80%	15.97%
	意大利占比	9.93%	9.63%	7.94%
	西班牙占比	7.72%	6.78%	6.0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OECD TIVA 数据库资料计算得出,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75537#>, 2019 年 3 月 29 日访问。

表 2 更清楚地显示了 2005-2015 年的十年间, 欧盟五大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项下的全球价值链变动情况, 除德国在各项指标下均稳步提升和增长外, 其他欧洲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不同水平的缓慢下降, 其中传统的欧盟核心权力国家法国在中

间品出口和最终品出口上下跌更为明显。这不仅体现出法国在欧盟和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地位变化,同时也与外界对法国近年来的直观感受相吻合,即其国家行动能力、经济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在逐步下降。<sup>①</sup> 一个可能的问题是,无论是表1还是表2,若从历史数据来分析,德国是否一直在欧洲处于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回答是肯定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数据的比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动态视角:以国别相对权重比例而言,表1中以中间品出口计算,如果欧盟五大经济体份额加总为100计,那么1995年德国的比例权重是35.08%,领先法国、英国15个百分点,领先意大利19个百分点,以及领先西班牙28个百分点。而到了2011年,德国的比例权重上升为37.56%,领先法国20.5个百分点,领先英国17.5个百分点,领先意大利22.5个百分点,领先西班牙27.2个百分点。德国的权重比例显著上升,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中间品进口和最终品出口中。另外,以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见表2)分析来看,同样以欧盟五大经济体份额加总为100计,那么在中间品出口项下,2005年德国的比例权重为33.62%,领先法国13个百分点,领先英国13.8个百分点,领先意大利17.9个百分点,领先西班牙23.4个百分点。而到了2015年,德国的比例权重上升为36.86%,分别领先法国、英国17个百分点,领先意大利23.7个百分点,领先西班牙26.3个百分点,类似的结果也发生在中间品进口和最终品出口项下。

数据比较看似枯燥,但它揭示了过去十几年间在欧盟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德国在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与权重显著上升,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其他欧盟主要国家的相对衰落。这就为我们理解近年来欧盟内权力格局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 (二)从产业增加值角度的观察

就理论而言,区域产业链只是一种“量”的反映,有些国家的个别产业虽然能够获得高营业额,但如果外部购入价值部分过大,则不过是价值转移而已,并不能代表该国产业实际创造的价值,也不能完全说明一个国家的价值创造能力,为此,全球产业链的研究必须引入“增加值”的概念。所谓“增加值”,指的是生产单位对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制造后的总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值。也就是说,“增加值”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产业通过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它代表了整个产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和实际盈余。而在现实中,以增加值描述的全球产业链,形成我们熟悉的典型的“微笑曲线”,其左

<sup>①</sup> 采用OECD两个数据库进行跨时段分析计算的原因是:(1)STAN数据库目前只提供了始于1995年至2011年的数据,而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以德国作为整体评估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2)TIVA数据库的统计更具有贸易增加值的客观性,它反映的是单一国家的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和地位。根据上述两个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通过统计计算发现,不仅结果高度吻合,同时还可以看到德国更具有全面的全球价值链中优势地位的能力,而这将为后续论述德国全球和区域国际权力变化提供实证支持。

右两端分别代表一个产业的研发和品牌销售两大环节。这两个环节也是产业链的最高增加值部分,而中间部分则是产业链的制造环节。虽然制造环节的产量规模可能较大,但这部分通常也是产业链增加值最低的环节。产业链与增加值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价值链”。

近 20 年来,欧盟制造业基本呈现萎缩状态,其表现为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在 GDP 中逐渐降低。从表 2 可以看出,1997-2017 年间,欧盟整体与法国、英国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的比重呈现下降态势,以至于到 2017 年比重分别为 14%、10%和 9%。而德国在 2011 年推出了“工业 4.0”战略政策,旨在把传统制造与最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相结合,完成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这就意味着德国采取了相当明晰的战略,要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在欧盟区域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与欧盟、英国、法国制造业比例下降不同的是,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所占比重并无太大变化,始终维持在 20%左右。下面表 3 展示了德国与主要欧盟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欧盟以及英法两国服务业增加值在 20 年间均呈上升状态,在 2017 年分别达到了 66%、70%和 70%,而德国在这项指标中全线落后,不仅百分比基数最低,而且增长速度也远低于欧盟整体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2017 年德国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例仅为 62%。这种现象既可以理解为欧盟内部多个国家服务业兴起与传统的制造业的下降,使得经济结构本身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同时也可以说明,德国逆“服务业扩张”,甚至是“逆全球化”潮流而坚持独立的发展战略,始终保持制造业的增加值比例,制造业在德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地位在过去 20 年间基本未发生变化。

表 3 德国与欧盟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1991 年	1997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12 年	2017 年
欧盟	20%	17%	15%	15%	13%	14%
德国	25%	20%	19%	21%	20%	21%
法国	16%	15%	13%	12%	10%	10%
英国	16%	15%	11%	9%	8%	9%
意大利	20%	18%	17%	16%	14%	14%
西班牙	/	16%	15%	13%	12%	13%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计算得出,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SRV.TOTL.ZS>, 2018 年 11 月 15 日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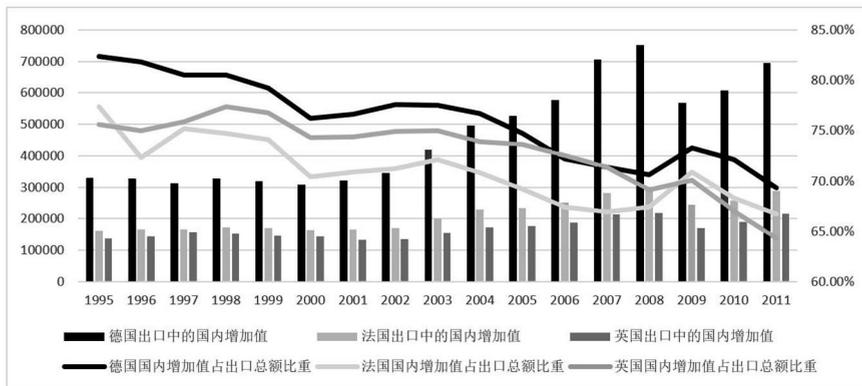
表4 德国与欧盟主要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1991年	1997年	2002年	2007年	2012年	2017年
欧盟	60%	61%	63%	64%	66%	66%
德国	56%	61%	63%	62%	61%	62%
法国	63%	65%	67%	69%	70%	70%
英国	67%	65%	68%	70%	71%	70%
意大利	60%	62%	64%	64%	66%	66%
西班牙	/	59%	60%	61%	67%	66%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计算得出,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SRV.TOTL.ZS>, 2018年11月15日访问。

在全球价值链中,一国产业增加值的大小可通过进出口贸易反映。其中,某个产业在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是基础指标。我们用图3描述了1995年至2011年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在制造业的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对比。从图3可以看出,德

图3 英、法、德三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与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  
(单位:百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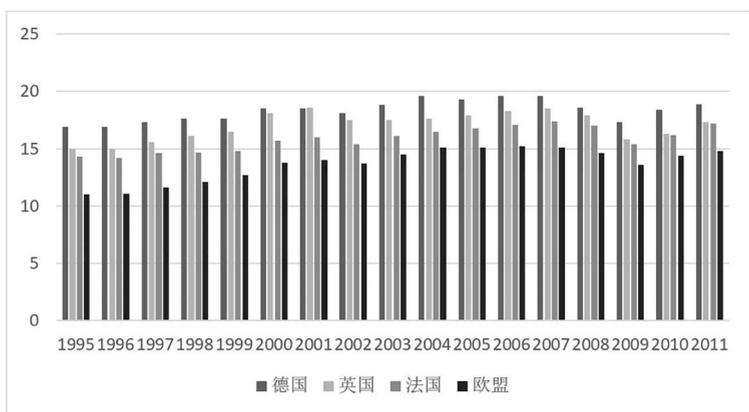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 OECD 数据库资料计算得出,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VA\\_2016\\_C1#](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VA_2016_C1#), 2018年11月11日访问。

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均远超英法两国,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超过了7000亿美元,是同年法国的两倍、英国的三倍;就制造业国内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出口额比重

的指标而言,三个国家均呈现下降状态,平均下降 10 个百分点左右。比重下降的原因在于区域价值链的延伸,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区域和全球的生产链条,德国、法国、英国则通过“外包”的方式把一些低增加值工序转移到了国外。但在增加值上,德国所占比重依旧是三国中最高的,即使是比重最低的 2011 年,其制造业国内增加值在出口额的比重也达到了 69%,而同年法国和英国则分别为 65% 和 63%。国内增加值的对比表明,德国国内制造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大于英法两国,而国内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则说明了德国制造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强于英法两国。这也就证明了,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德国的地位要高于英法两国。

衡量一国在区域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位置,不仅要看本国产业增加值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还要观察本国产业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为此,我们采用全球价值链中“本国增加值在外国出口总额所占比重”这一指标<sup>①</sup>,比重越高说明该国对其他国家产业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越强,更能体现这一国家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主导作用。图 4 计算了德国、英国、法国和欧盟 28 国整体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外国出口总额的

图 4 德国、英国、法国、欧盟整体制造业增加值在外国总出口中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OECD 数据库,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VA\\_2016\\_C1#](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VA_2016_C1#), 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比重,1995-2011 年间,德、法、英三国所占比重均高出欧盟。其中,德国除了 2001 年被英国略微超过外,其余年份均处于领先地位。这就说明了德国制造业对经济的带动

<sup>①</sup> 该指标为 OECD 数据库统计指标,意指本国产品增加值在第三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如韩国零部件增加值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苹果手机中的总出口额的比重。

作用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究其原因,在区域价值链中,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外国出口总额中,主要分布在价值链的供应端,即德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研发和技术被其他国家所采用,或者说德国制造业的技术和研发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特征,这也给德国带来了超越欧盟区域之外的国际产业链定位权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以“量”为核心的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中,还是以“质”为核心考量的区域价值链中,德国制造业分别拥有最大的体量、占据最高的位置。由此可见,德国制造业处于欧盟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它的发展主导着欧盟区域价值链的前进方向,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欧盟“硬力量”的构成基础。

#### 四 德国区域主导权的崛起<sup>①</sup>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国家权力的表现不再是传统的“控制权”,而是“主导权”。同样,德国的崛起也表现为德国在欧洲的区域主导权的上升。德国的主导权依托于自身庞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处于欧盟区域价值链的核心位置,通过危机时刻的财力支持、对规章制度和决策的影响、对区域发展方向的引领以及对区域意识形态的输出表现出来。近年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造成了欧盟内忧外患的困局,直接后果便是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但对德国来说,如何在这三大危机中发挥自己的“主导权”,左右欧盟的集体反应并带领欧盟走出当前的困局,并使其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客观上检验德国国际权力崛起的主要标志。

##### (一) 欧洲传统大国的领导力集体衰落

从历史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英国等国热衷于为欧洲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无论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还是代表欧盟参与国际事务,这些国家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近年来,在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的三大危机期间,法国、英国等欧洲传统大国在领导力上均出现了明显的角色缺失,以至于无法带领欧洲走出困境。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困境和国内政局不稳两大问题导致上述国家实力下滑,无暇他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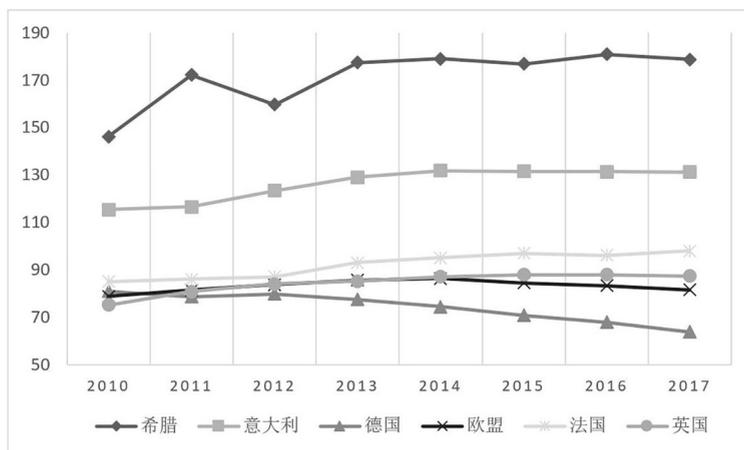
一方面,长期流行于欧洲的福利社会模式,造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欧债危机爆发并快速蔓延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以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甚至包括法国在内,普遍存在“过度福利”政策,导致巨额的公共开支超过了国家自身的经济能力。

---

<sup>①</sup> 一个国家的区域主导权与国际权力的关系是一个混合型关系,欧债危机、欧洲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这三大危机看似关乎欧洲,但其处理过程却是全球性的,其后果也是全球性的,特别是在欧盟机制下,德国主导欧盟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全球性国际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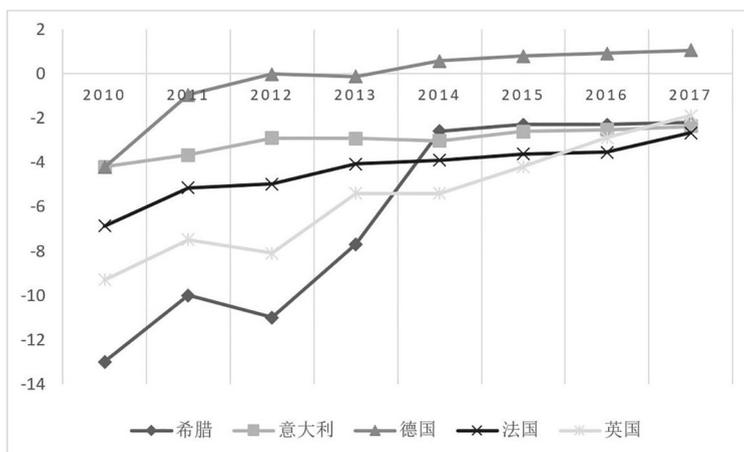
在财政支出超出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税负之时,部分国家只能通过借债来弥补开支缺口(见图5、图6);而以德国为主的北部欧洲国家,长期推行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通

图5 2010-2017年欧盟主要国家年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欧盟统计局,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SRV.TOTL.Z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et00062&language=en>, 2018年11月21日访问。

图6 2010-2017年欧盟主要国家的财政平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欧盟统计局,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SRV.TOTL.Z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et00062&language=en>, 2018年11月21日访问。

过实际生产和出口拉动经济,因此,也有学者把欧债危机称为“南方财政罪犯”和“北

方预算圣人”的道德故事。<sup>①</sup>与此同时,欧洲多个国家存在长期注重服务业而忽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情况,使得欧洲出现了普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导致第二产业的萎缩,致使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而过度发展服务业,尤其是依赖债务的过度福利政策,最容易受到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迅速陷入债务危机泥潭的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大批难民的涌入,欧洲民粹主义趁机兴风作浪,在政治上表现为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右翼民粹政党高举反对欧元、反对接收难民、反对一体化的旗帜,不仅向欧洲传统的“政治正确”发起挑战,而且束缚了各国政府的行为,导致欧洲国家在应对危机时,受到更多来自国内民粹主义的限制,难以有所作为。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的传统大国,其国内右翼民粹政党国民阵线的强大势力,使得总统奥朗德不敢在接纳难民问题上表现积极,以至于在难民危机中,法国的角色几乎完全缺失;<sup>②</sup>意大利作为欧洲主要经济体,也受到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双重影响,在“伦齐改革”失败后,国内民粹政党五星运动和联盟党主张刺激投资、增加福利开支、削减税收等宽松财政政策,显然与当下欧盟解决“债务后遗症”、提倡财政紧缩的政策背道而驰,<sup>③</sup>并使意大利在危机中逐渐倒向欧盟的对立面;同样,作为长期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虽然综合国力位居欧盟前列,但在三大危机中却是袖手旁观,直接在欧盟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公投,选择了“脱欧”,企图通过一走了之来摆脱危机的困扰。

可以说,近年来欧盟的三大危机引爆了欧盟国家存在已久的内部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而在传统大国出现领导力集体性衰落的同时,欧盟也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这就为德国掌握欧盟区域主导权提供了客观条件。

## (二) 德国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危机治理中的主导权

鉴于欧洲各大国在危机中的衰落,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欧元面临质疑,俄罗斯又在西部发起了安全挑战,这些变化显然不符合德国的根本利益。为此,德国开始放弃传统的“克制外交”,转向“有为外交”,试图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主导欧盟的危机治理。受历史问题的制约,德国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并不足以支撑“有为外交”,但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在现实中必然要凭借经济力量去争取危机治理的主导权。

首先,在欧债危机的治理中,德国通过向重债国和救援机制注入资金的方式,对欧

<sup>①</sup> Matthias Matthijs, “The Three Faces of German Leadership.”

<sup>②</sup> 郑春荣:《难民危机考验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力》,载《文汇报》,2016年5月13日。

<sup>③</sup> 《意大利联盟党松口:愿与五星运动联合组阁》,新华社,2018年3月16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16/c\\_129830349.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16/c_129830349.htm), 2018年12月2日访问。

盟进行整体性救助。在经历了早期的观望后,德国以最直接的方式迅速介入债务危机,向重债国提供了大量临时性的救助资金:2010年5月,以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同意在三年内共同为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德国承担欧元区份额中的224亿欧元,占比达28%;另外,在欧盟2010年11月为爱尔兰提供的850亿欧元援助以及2011年5月为葡萄牙提供的780亿欧元援助中,德国均占有较大份额。<sup>①</sup>与此同时,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为了应对债务危机而临时成立了欧洲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德国凭借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成为两大救助机制的最大股东(见表4),帮助它们在危机中发挥作用。通过对欧

表5 EFSF/ESM 两大机制认缴金额前五位国家(2012年)

国家	EFSF	ESM		认缴百分比
	认缴金额(百万)	实收资本(百万)	认购资本(百万)	
德国	€ 119,390.07	€ 21,717.1	€ 190,024.8	27.13%
法国	€ 89,657.45	€ 16,308.7	€ 142,701.3	20.38%
意大利	€ 78,784.72	€ 14,331.0	€ 125,395.9	17.91%
西班牙	€ 52,352.51	€ 9,523.0	€ 83,325.9	11.90%
荷兰	€ 25,143.58	€ 4,573.6	€ 40,019.0	5.71%

资料来源: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Annual Report 2012, <https://www.esm.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sm2012annualreport.pdf>, 2018年12月20日访问。

洲国家的积极救助,德国完全确立了自身在欧债危机治理中的主导和控制角色,而推动ESM、EFSF等长效治理机制的建设表明德国的主导权已不再局限于个别国家,逐步向欧盟整体扩展。为此,2011年11月,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柏林发表演讲时说道:“相对于德国的强大,我更害怕德国的无所作为”。<sup>②</sup>

其次,在难民危机治理中,德国再次体现了有目共睹的主导权,成为欧洲应对难民危机的中流砥柱。尽管德国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而是经历了由“谨慎对待”到“开放欢迎”,再到“收紧审查”的转换。但总体来看,德国在面对难民危机时还是显示出比其他国家更强的开放态度,使其成为接纳难民最多的欧洲国家,以至于凭借一家之力,承担了欧洲三分之一的难民接纳数量。在最高峰值的2015年,共有超

<sup>①</sup> 李巍、邓允轩:《德国的政治领导与欧债危机的治理》,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6期,第74-104页。

<sup>②</sup> 人民网:《欧债危机凸显德国主导地位》,2012年1月13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36457/16869453.html>, 2018年12月20日访问。

过 100 万名难民在德国登记申请避难,这是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匹敌的。<sup>①</sup> 在接收难民的同时,德国政府还为每一个到达德国的成年难民每月发放数百欧元的补贴,并承诺愿意为难民承担回家的路费。据统计,德国每安置一个难民,在衣食住行及管理等方面的成本开支,一年就需要花费约 13000 欧元。<sup>②</sup> 为此,联邦政府向州和地方政府额外拨款 180 亿欧元。<sup>③</sup> 这种财政实力是处于债务压力中的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肩的。在如何安置难民的问题上,德国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消极应对,而是利用国内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发挥职业培训体系的优势,在短期内对难民进行相关的培训,以从事一些临时性的、简单的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老龄化和“工业 4.0”造成的低端产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说,德国在难民问题上承担了欧洲的“道义主导权”。为此,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 2015 年 11 月指出:“欧洲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如何处理难民危机”,“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德国,观察来自柏林的信号”。<sup>④</sup>

最后,肇始于 2013 年年底的乌克兰危机,是对德国在欧盟内部建立主导权的另一种考验。在美国致力于北约东扩、极力削弱俄罗斯的背景下,德国采取了“谈判加制裁”的更为灵活的措施。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可以说是“唯一”能和俄罗斯直接进行对话的国家,其原因就在于以经贸联系为基础的德俄“特殊关系”。根据 2013 年的数据,德国是俄罗斯在欧洲最大的资源需求市场,俄罗斯约有 35% 的天然气和超过 30% 的石油出口到德国,德俄两国贸易额超过 765 亿欧元,德国约有 30 万个工作岗位取决于与俄罗斯的贸易,6200 家德国公司活跃在俄罗斯,对俄投资约 200 亿欧元。<sup>⑤</sup> 因此,用“相互依赖的经济”描述德俄关系的基础并不为过。为此,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作为欧盟经济实力最强、与俄罗斯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国家,德国既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对俄罗斯进行制裁,<sup>⑥</sup>又能够在欧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利益攸关方之间进行斡旋,促使它们在日内瓦、明斯克和柏林等地举行数次会谈,旨在化解紧张的乌克兰局势。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柏林与莫斯科在危机期间仍然保持密切的沟通。据统计,在

① <https://www.bloomberg.com/>, 2018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② 《欧洲难民安置难点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六个方面》,人民网,2016 年 6 月 1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6/0615/c1002-28447643.html>, 2018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③ Matthias Matthijs, “The Three Faces of German Leadership.”

④ 伍慧萍:《德国能否在难民危机中再次主导欧洲》,北京周报,2016 年 1 月 6 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1601/t20160106\\_800046113.html](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1601/t20160106_800046113.html), 2018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⑤ OAOEV, „Ost-Ausschuss warnt vor Wirtschaftskonflikt“, <https://www.oaev.de/index.php/de/ost-ausschuss-warnt-vor-wirtschaftskonflikt>, last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8.

⑥ 例如,限制俄罗斯部分官员入境欧盟、增加俄罗斯国有银行进入欧盟资本市场的难度、禁止对俄进行用于石油开发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等,以此来规约俄罗斯,使其不敢在兼并克里米亚之后有进一步的扩张行动。

危机最严重的 2014 年 1-9 月,普京与默克尔的通话次数达到了 35 次。与之相比,普京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间的通话分别仅为 16 次和 10 次。<sup>①</sup> 这种沟通机制贯穿在整个乌克兰危机期间,使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话的平台。

### (三) 主导构建危机治理的长效机制

作为欧盟危机治理的主导国,德国不仅致力于解决当前的棘手问题,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德国主导的治理措施机制化,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规避各种危机对欧盟的侵害,最终目标是避免欧盟的分裂,推动欧洲一体化并主导进程。德国主导的机制构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通过签订合约的方式对欧盟进行制度化建设、通过压力传播以“德国模式”为核心的治理价值观。

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德国的主导作用贯穿于三大危机。欧债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欧盟统一的货币权和分散的财政权之间的不匹配,以至于欧盟要为个别成员国的财政混乱和赤字埋单。为此,德国在主导债务危机治理的过程中,也从制度层面推动欧盟成员国的“财政改革”,将救助措施与国家财政改革挂钩,以加强对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监管。2012 年 3 月,在德国的推动下,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欧盟 25 个成员国批准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简称“财政契约”)。“财政契约”首次赋予欧洲法院判定一国是否遵守财政纪律的权力,同时,也要求每年举行两次由欧盟委员会与各成员国国家元首出席的欧元峰会,致力于各成员国与欧盟整体的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此外,在德国的注资和推动下,成立于 2012 年的欧洲稳定机制成为欧元区的永久防火墙,为陷入金融危机困境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救助计划。更重要的是,ESM 规定,接受救助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成员国必须批准“财政契约”。可以说,财政改革是一场德国以自身“融资能力”换取其他欧元区成员国“财政权”的政治博弈。<sup>②</sup> 与此同时,面对来势汹汹的难民潮,在欧盟束手无策之时,德国首先提出了“难民分摊机制”,从整体上对难民进行比例分摊,各成员国按照一定的配额接收难民。这项提议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支持,并于 2015 年 9 月通过了“难民分摊法案”,欧盟也投票通过了转移安置意大利、希腊等国境内 12 万外来难民的方案。虽然这项法案引起了中东欧个别国家的反对,但难民分摊机制把分散应对难民危机的欧盟国家

<sup>①</sup> „Wladimir Putin und seine Telefonate mit Angela Merkel und Co“, Spiegel, 11/09/2014,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wladimir-putin-und-seine-telefonate-mit-angela-merkel-und-co-a-990795.html>, last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8.

<sup>②</sup> 赵柯:《德国的“欧元保卫战”——国际货币权力的维护与扩张》,载《欧洲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64-86 页。

再次汇集在一起,在德国的带头示范下,欧盟共同应对危机、共同分担责任,最终渡过了难民涌入的高峰期,基本保持了欧盟的完整性。在处理乌克兰危机时,德国着眼于地区安全秩序的恢复,积极推动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在2014-2015年乌克兰危机高潮迭起的一年中,危机各方先后达成了《乌克兰危机调解协议》《日内瓦协议》《明斯克协议》、“柏林宣言”等一系列共识。其内容由最初的改组乌克兰政府,发展到后来的停止暴力冲突,再到派遣欧安组织监督停火等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安排。而在这一系列安全机制的构建中,均能看到德国的身影。德国扮演的“调停人”,不仅有效地缓解了紧张局势,而且使欧盟成为乌克兰危机解决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以压力传播“德国模式”方面,德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经济上推广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德国模式”。德国介入欧债危机以后,对希腊等国扩张型经济模式的清算随之而来,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政界人士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希腊等国的发展模式,甚至扬言要把不遵守规则的国家踢出欧元区。与此同时,德国和欧盟委员会也把降低财政赤字作为发放救助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要求希腊实施一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在援助压力下,希腊议会2011年6月通过了包括裁员、加税等一系列计划的财政紧缩法案,以换取当年120亿欧元的财政援助。第二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6.6%,完成了原定紧缩目标。<sup>①</sup>不仅如此,在2012年的“财政契约”中,德国主导的财政紧缩的理念得到充分体现。这表明,紧缩模式已不再是单纯的援助条件,而是逐渐在欧盟内部得到制度化。除此以外,“德国模式”还表现为避免单独应对危机、坚持欧盟的整体性,尤其是坚持“法德轴心”和法、德、波“魏玛三角”两大机制,充分发挥法国、波兰等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作用,协同应对危机。因此,无论是三大危机中达成的一系列协定和法案,还是各项政策的落实,均是以欧盟整体的身份完成。这一方面维护了欧盟、欧元区、申根区整体上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在处理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时,能够发挥集团作用,使欧盟与美国、俄罗斯等强国齐驱并驾,无形中提高了欧盟的国际影响力。而德国在其中更多的是发挥协调、引领、主导方案的作用,充分展示了区域主导权的现实存在。

## 五 区域价值链与区域主导权的关系

德国既是欧盟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国家,也是应对欧盟三大危机的主导国。马克思

<sup>①</sup> “希腊完成去年减赤目标赤字占GDP比重降至6.6%”,中新网,2013年2月6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3/02-06/4552244.shtml>,2019年1月1日访问。

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作为经济基础的区域价值链,如何对德国主导权产生作用呢?

### (一)区域价值链与经济实力的关系

作为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国家,德国具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是其区域主导权的主要支撑,也为其发挥区域主导权提供了“可能性”。

德国的经济实力,不仅表现在 GDP 或者国家财富是欧盟第一,更重要的是控制区域产业的能力。这种“控制力”并不等同于权力政治下对国家、人口、主权的征服,而是体现为对区域内生产结构的主导和安排。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的观点,“生产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社会中的权力中心与生产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sup>①</sup> 德国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控制,就是由德国决定生产的方式、生产的内容,以及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工具等生产要素的组合。在欧洲区域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中,德国在研发和销售两个高增加值环节中,分别位于顶端的位置,这就意味着德国不仅垄断了生产的上游位置,而且控制了生产的下游渠道。在现实中,这种优势表现为德国的高科技水平和品牌效应主导欧洲产品的生产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定价等一系列要素。这也是在三大危机中,德国不但拥有经济实力来发挥主导作用,还能要求个别国家按照“德国模式”进行财政改革的根源所在。

区域价值链不仅赋予德国主导欧洲生产结构的权力,而且给予德国主导欧元的货币权力。欧元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更是一种“国家间政治”的产物。欧元在欧盟所扮演的角色,实质上是一种最具含金量的权力——国际货币权力,一种对其他成员国行为的影响力和支配权。<sup>②</sup> 而欧元币值的稳定,则依托于欧洲产品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又依托于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因此,欧元的存在,正是依托于德国本身的强大生产力。与此同时,欧元也可以被视为德国为欧洲发展提供的“公共产品”,欧元区国家借助这个欧洲共同货币,分享德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树立资本市场良好的信誉和低成本融资能力,增强欧洲各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但是,各国也由此失去了独立融资的渠道,通过欧元途径进行融资成为欧元区国家唯一的选择,而这个渠道的闸门实际上是由德国控制。可以说,欧元与德国的主导权相辅相成:欧元的强劲依托于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而德国视欧元为主导欧洲的货币权力。因此,德国之所以积极拯救欧债危机,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要“保卫”欧元。

还需要指出的是,区域价值链依托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而作为区域价值

<sup>①</sup>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第62页。

<sup>②</sup> 赵柯:《德国的“欧元保卫战”——国际货币权力的维护与扩张》,第64-83页。

链的核心国家,德国也是欧洲实体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这使其避免了“产业空心化”造成的社会失业、金融泡沫、债务陷阱等经济负担,客观上保障了强劲的经济实力。

### (二)区域价值链与共同机制构建的关系

区域价值链是区域内国家生产和贸易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需要商业利益的引导,更需要通过“契约”的形式予以保障,产业政策、营商环境、贸易合同和税收法规等一系列对经济活动的规范,都是区域价值链能够正常运行的保障。所以,区域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区域内纷繁复杂的契约关系。作为区域价值链核心的德国,在危机中成功地把价值链引导者的角色转化为危机治理的引领者,从中确定了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并通过构建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确保自身的优势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所得。就此而言,区域共同机制的构建,可以视为德国确立主导权的“必要性”。

这也构成了德国主导权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即主导各种应对机制和长效机制的构建。它既是应对危机的过程,又是解决危机的结果。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的生成和演变,是成员国公共利益需求的产物,是服务于全体成员国的公共物品,但同时,它又是领导国权力推动的结果,服务于领导国的私利战略目标。<sup>①</sup>从区域价值链角度来看,这些机制的构建缓解了危机对欧盟国家的侵害,维护了地区安全与和平的秩序,保证了欧盟的整体性,最终为区域价值链的运行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因此,这既符合制度现实主义下各国公共利益的需求,也满足了主导国德国的私立目标。

### (三)区域价值链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在德国看来,主导权的发挥不能仅凭经济实力和规章制度的建立,更要从根本上贯彻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思想文化上的主导权,这可被看作德国发挥主导权的“根本性”。

德国经济的崛起,走的是一条介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的干预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发展理念被称为“弗莱堡学派”或者“奥尔多主义”——强调竞争、价格稳定、财政紧缩,以及规则高于一切的认同理念。伴随着欧盟区域价值链的形成与德国地位的确立,这套发展理念也传播到其他欧盟国家,以此带动各国的生产和对外贸易,最终实现国家间和产业间的融合。因此,在欧债危机期间,德国不遗余力地敦促欧洲各国进行财政改革,本质上也是对自身发展理念在全球价值链范围内的推广。不只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在处理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时,德国的一体化思想也贯穿于其中:强调欧洲的集体反应,发挥欧盟整体作用,对难民共同承担责任,对俄罗斯采取一个声音说话。对于区域价值链来说,欧洲一体化思想不单单保证

<sup>①</sup> 李巍、邓允轩:《德国的政治领导与欧债危机的治理》,第74-104页。

了欧盟的整体性,也保障了区域价值链的完整,确保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区域生产链条的组成部分;同样,区域价值链的形成也有利于贯彻一体化理念,即通过生产的融合和贸易的开展,将欧盟的利益与各国的国家利益进行捆绑,增强成员国对欧盟一体化理念的认同。

## 六 结论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看到,德国凭借自身在全球和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三大国际事件中逐渐树立起在欧盟内部的主导权,基本实现了欧洲区域内的权力转移。而过去十年间刚刚发生的现实案例,固然只是局部性的经验证据,却也为我们理解国际权力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首先,德国案例表明,运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理论和工具来解释当下全球化生产时代的国家权力变化可以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传统国际关系领域研究国家权力时,经常面临研究工具与实证数据的缺乏,而观察和比较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变化,可对此做出弥补。此外,价值链的视角更符合当前各国经济深度相互依赖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的“工业化”权力观在当下全球化时代的解释力不足问题,破除某些基于传统工业时代经验研究得出的固化判断,例如对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再认识和再解释。传统的“工业化”权力充分使用的国际争端解决方法,如贸易制裁、禁运、加征关税是大国使用国际权力、维护自身“利益”的惯用手段,可能会产生预期效果。但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生产网络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结构性存在,使得传统权力工具的运用变得成本高昂,甚至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理论和研究工具,有助于我们分析和判断当下复杂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全球主要国家的对外政治经济行为和决策行动。例如,在伊朗制裁案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态度:欧洲由于与伊朗存在资源端结构性和区域性价值链联系,更倾向于对话解决;同样,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无论美国国内某些极端的恐吓言论再怎么刺耳,由于中美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巨大的价值链联系,通过谈判而不是贸易报复才是双方各自的理性决策选择。因此,当复杂的、网络内嵌状的全球价值链存在时,任何国家的对外政治经济行为均受到内在的隐形的客观条件制约,任意使用国际权力的莽撞决策均可能给自身利益带来损害。

再次,应该看到全球价值链,包括区域价值链的主导权是一种典型的现实国际权

力。它虽然不能等同于传统现实主义语境下的控制权,也缺乏通常意义的强制力和惩罚力,但是它的存在,可以使国家在全球经济核心利益领域充分发挥“定价权”作用。基于价值链的主导权作为一种方向性的引领和话语权存在,可以借助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基础上的共同利益,通过机制保障国家显性和隐形能力扩散,甚至包括意识形态的压制性传播。

最后,一个国家的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优势不是凭空取得的,它必须存在和嵌入全球化生产网络,同时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而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和所得是基础。这就意味着游离在全球生产网络之外的国家很难攫取国际政治与经济权力,而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的国家可能只获得有限的权力,缺乏全产业链嵌入的上游资源端国家也具有先天的结构性缺陷。而德国的案例证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全球领先的生产能力,是其获得全球特别是区域价值链优势的基础,这意味着经济学中“服务业比例提高是经济发展必然追求和必由之路”的传统认识可能会面临挑战,我们也有必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断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制造业的价值定位。

综上,采用价值链视角来分析德国在欧盟的区域主导权,可以为近年来欧盟内部的权力转移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也为全球层面权力转移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德国的经验是否可以在全球层面复制?获益于一体化机制作为稳定的政治容器,德国是在非冲突的环境下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能力实现了欧盟权力的承接和控制,但全球层面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博弈,传统权力是否依然发挥较大的作用,国际权力转移是否以和平方式完成?对此,我们不能回答也无法预测全球权力转移是否会以激烈冲突的方式完成,正如世界历史曾经展示的那样。但是,以上述及,在当下已经形成复杂的全球网络性、嵌入式价值链的环境下,任何摧毁既有全球价值链的行为,其经济成本和政治代价将不可预测。而在此环境下,一个国家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与塑造能力,就是其参与和影响全球事务包括全球行动的基础。就全球层面来看,目前美国依然是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之一,并未失去其全球权力基础的内在支撑,而中国在过去20年间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也已成为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之一,其国家地位和国际权力上升基础正是源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扩张。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塑造和参与,包括优势地位的取得,是当下一个国家全球权力的保障和基础。

(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黄郑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